

2006年黎以冲突中的中国外交

王震 朱书玉 | Wang Zhen Zhu Shuyu

2006年7月12日,不期而至的黎以冲突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区冲突,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部分驻外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这场危机。从撤侨、斡旋到增兵,这些举措既体现出了中国外交新思路和中东问题新政策,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决心。

应对危机,稳健出招

从7月12日危机的爆发,到8月14日的协议停火,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沉着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冲突危机。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2日到7月25日,主要是冲突爆发初期的紧急应对阶段。冲突爆发后不久,中国驻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三国大使馆先后启动应急机制,探讨并拟定紧急情况下预案。各使馆还开设了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随时帮助在冲突区域的中方人员安全撤离。到18日,随着局势的升级,中国驻黎巴嫩使馆除留守小组外,也开始撤往叙利亚。同一天,外交部也启动了应急机制,协助在黎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撤离,并密切跟踪当地局势发展。外交部网站两次发布《出国特别提醒》,同时指示驻黎使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制定预案,做好紧急事态下救助、撤离中国公民的工作。从14日开始,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开始分期分批安排中国侨民和中资机构撤离。到7月26日,在黎中国公民共计170人,其中包

括7名香港同胞,在外交部和驻黎巴嫩、叙利亚、塞浦路斯等使馆的密切配合下,安全撤离冲突危险地带。

成重建,中国政府在7月份向黎巴嫩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物资援助的基础上,8月份宣布再次向黎提供2000万元人



在不期而至的黎以冲突中,中国政府沉着应对,稳健出招。

第二阶段从7月26日到8月14日,是国际危机的管理与控制阶段。中国政府在国际危机升级后积极介入,开展紧急斡旋与协调。此期间的外交行为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就中国驻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杜照宇被炸事件进行交涉。其次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黎以冲突的解决,包括促成联合国《1701号决议》的通过。最后是派出特使,加大斡旋与调解的力度。

第三阶段主要是从8月14日停火到当前的战后重建,国际危机平息后的善后处理与新局势的维持、协调工作。8月14日,联合国停火决议正式生效,然而,这时的停火只能算是一种脆弱不堪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有关国家的邀请,决定增派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至1000人,以维持战后的局势。为帮助黎巴嫩解决人道主义灾难,尽快完

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人为本”,紧急撤侨

此次黎以冲突中,中国外交的第一个大规模举动无疑当数黎巴嫩撤侨事件。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一道,在紧急状态下很快将170多名中国公民撤离到安全区域,包括37名香港同胞,而且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按照国际上的一般做法,撤侨至第三国后所发生的交通、住宿费用是需要由个人承担的。国内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的这次撤侨行为进行了充分报道,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侨报》就撤侨行为进行评价说,“170位华侨从黎巴嫩安全撤出,印证着中国外交应急机制的有力有效,也彰显着中国的强大实力,同时更折射着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文章还指出:“以人为本”运用在

外交战线,就要以散居各国的华侨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为本。当华侨在外生命安全遇到威胁,就要给予关怀与帮助;当华侨有正当诉求,就要想方设法提供必要的援助。

随着最近几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新的历史现实也赋予中国外交以新的重任。根据外交部领事司的统计,仅2005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就处理了总共近三万起领事保护案件。根据领事司有关官员的介绍,2006年以来,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一道已经在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分别包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撤侨事件,领事保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一项主要内容。2006年8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外事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指出:“外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外事工作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适应我国企业和人员大量走出国门的新形势,依法维护我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要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要求和期望,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在新形势下不断与时俱进,勇挑重任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在领事保护中的行为正是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最好体现。

增兵维和,积极介入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以强制方式帮助冲突各方维持和平、恢复和平并最终实现和平的一种行动,也是二战后联合国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根据安理会第425号、第426号决议,联

合国安理会于1978年向黎巴嫩南部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在2006年爆发军事冲突之前,这支部队有1991人,分别来自印度、加纳、法国、波兰、中国等7个国家。参加黎巴嫩维和任务的中国维和工兵营由182人组成,先头部队于3月31日抵达,第二批于4月16日抵达黎巴嫩会师。

7月26日,中国维和士兵杜照宇的遇难引起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国内不少民众自发地以各种方式悼念杜照宇烈士,同时要求中国积极参与调停黎以冲突的呼吁也不断增多。8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杜照宇和他生前的同事们,他们既担负着联合国的使命,又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在双重使命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都承担了巨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意义在于,它扩大了武装力量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价值,更改变了以往对于军人和国家使命的定义。”“军人使命的延伸,也是国家使命的延伸。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势必会更多地承担起冲突地区的观察和维和使命,更多的中国军人会走上国际舞台,去承担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扩大,是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一起的。”9月12日,《解放军报》在一篇署名文章说道:“杜照宇以自己的无畏与无私,履行了中国在新世纪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奉献精神 and 坚定决心。”

联合国安理会虽然在8月11日通过了旨在制止黎以冲突的《1701号决议》,但还需要有足够的手段来执行这项决议。按照决议,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将增至1.5万人。但美国此前已经明确表示,美国虽不反对派兵,但不会参与派兵。作为此次的冲突的当事国之一,以色列明确反对“非建交国家”参与黎巴嫩南部的维和行动。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不断向中国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在黎巴嫩维和行动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把向黎巴嫩派遣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增至1000人。这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向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以来,中国第一次派遣如此大规模的维和力量。温总理的讲话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应。普罗迪总理当即表示,他对中国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表示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表现,并希望中国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温总理发表谈话的第二天,《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一个日益自信的中国正向联合国展示着自己的影响,愿意让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行动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新世纪,新期待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解决黎以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以更加稳健的步伐介入中东和全球其他国际事务,正在努力担负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和谐世界”的构建。从发表声明到派出特使进行斡旋,再到派驻较大规模的维和部队,表明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关注正在增加,而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也正在经历一个转型与蜕变的过程。中国的中东政策在经历了长期的超脱与平衡之后,开始了积极参与和稳步介入的阶段。美国《中东季刊》去年春季号发表文章评论到:“9.11以来,中国正在中东地区更为大胆、也更为自信地推进其战略目标。”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解决中东问题,包括积极参与调停此次黎以军事冲突既是中国中东政策不断调整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不断扩展的结果,更是中国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后的表现。正如香港《南华

早报》在2002年所指出的：“中国在中东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与他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同步上升的。”一位英国学者就中国参与黎以危机问题发表评论说：“如果中国在其外交中体现出虽然还不成熟但却能激励世界的一种中国式的

领导模式，让外界认识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依赖于美国和西方，中国是世界新和平的缔造者与维护者，那么中国就能自己主导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辩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将不再是‘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吗’，而是‘中国将带来什么新

的机遇’”。

作为2006年中国外交的亮点之一，中国政府在此次黎以冲突中的外交举措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中国外交转型与未来和平发展的思索，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新的期待。^[40]

中日传媒视野下我国国家形象的修复

晋晓兵 | Jin Xiaobing

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一期有关中日问题的特别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深有感触地说：“站在日本东京的街头，背后的路标上有我们熟悉的汉字，这似乎是每一个到达日本的中国人的第一感受（很熟悉），因此，当我路过报刊亭的时候，总有买上一张报纸的冲动，因为那里有我太多熟悉的汉字，但是当报纸拿到手里，我才发现其实最熟悉的地方你也最陌生，毕竟它是日本汉字。”中日双方，看似熟悉其实最陌生，缺乏足够的相互了解因此也缺乏足够的互信。加上右翼势力的恶意煽动，日本的国内媒体经常把中国“强硬”、“威胁”的形象作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国民的认知中进行渗透。这就造成了同样一则消息，在我国的媒体上是一个味道，到了日本媒体上就变了味。例如，曾有教授谈到“神舟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件举国同庆的大事，而当天日本的许多媒体则在自己的报纸版面、节目频道中突出的报道中国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村的失学儿童、环境污染等等，并且有些社论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个农村小学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兴国家的国度，但是在尖端科技上投入那么多钱，也未必能证明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虽然有大量的旅游、参观、访问、学术交流团体来到中国，但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还是大众传媒。由于少数西方传媒对当代中国的曲解，误读甚至妖魔化倾向，或者对历史印象的静态停留，往往使国际社会获得的信息与中国的现实相距甚远，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明确表示：“目前中国对国际舆论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地位也并不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建设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回答针对中国的问题，反对针对中国的攻击，提高对突发事件报道和对外辟谣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我国传媒在处理中日相关问题的报道时，一方面，要对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无端挑衅据理力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方的无理，对于日本媒体的善意批评要做认真的研究，正确的就接受，错误的就耐心解释，而不是去煽动国民“抵制日货”、“围攻日本领事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对立和磨擦，要致力于对日本予以更多角度的描述，毕竟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像战后日本神话般崛起的经济，日本的管理经验，日本的福利制度，日本人勤劳敬业的精神以及爱好和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源远流长的历史交流曾使彼此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音符。但是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及对待历史问题态度上的差异，使得我国的国家形象在两国媒体的表述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位，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损害。面对这种情况，现阶段我国媒体所应采取的措施是什么？